



2007/10/20 全新改版

全新改版
NEW SITE ONLINE

汇聚中国传媒思想力 深度·理性·独立

学术网 >> 理论 >> 传播史论

新闻史上的《新潮》=历史上的《新潮》？

2005-01-10

作者：吴麟 | 23486字节 | 阅读：55次 | 评论：0条 | 关键词：新潮 新闻史 来稿选登

[关键词]：新潮 新闻史 来稿选登

内容摘要：《新潮》是“五四”运动以前，一份由学生主办的白话期刊。它追随《新青年》，当时很有影响，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独有的贡献。但相关中国新闻史的著作，要么回避对它的介绍；要么语焉不详，且论述存在偏颇之处。本文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提出：我们应尊重历史，正视《新潮》的存在，给其以合理评价。

关键词：《新潮》 合理评价

一、缘起：新闻史对《新潮》的评价

“五四”运动之前的数月，一群北大学生创办的一份月刊，激起了强烈的波澜。旧式文人纷纷责难，视其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1】；而先进的知识界则很看好，鲁迅先生称赞该刊“颇强人意”【2】。由于“文字浅显易懂，甚为广大青年读者所喜爱”【3】青年学子争相传阅，“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4】，所以“销路很广，在南方的乡间都可以看到”【5】。第一期面世后，转眼间销售一空，以至重印到第三版，销售了13000多册。这份刊物就是《新潮》。

《新潮》是由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的，是“五四”运动以前，一份以《新青年》为榜样，由学生主办的白话期刊。它创刊于1919年1月，1922年3月出至第3卷第2期停刊。“五四”前，编辑部由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3人组成，傅斯年任主任编辑；“五四”后不久，傅斯年、杨振声出国留学，改由罗家伦一人主编；罗家伦出国后不久，改由周作人担任主任编辑。

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新青年》孤军奋战之际，《新潮》杂志脱颖而出，毅然投身于新文化阵营，因而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支持与帮助。李大钊“曾给过《新潮》许多的帮助和指导，他虽不公开出面，但经常和社员们联系，并为《新潮》写稿。”【6】而蔡元培除在经济上对《新潮》的出版进行扶植以外，还从舆论上、道义上给予支持。当守旧派攻击、谩骂《新潮》的时候，他公开站出来为之辩护，说“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当教育总长傅增湘指责《新潮》“因批评而涉意气”，“张新说而悖旧谊”的时候，蔡元培为之辩解道：“据《新潮》编辑诸生言，办此杂志初心，原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本，批评之事，仅属末节”，“至于持论有殊于旧贯者，容为外间误会之所集；然苟能守学理范围内之研究，为细密平心之讨论，不涉意气之论，则少为逆俗之言，当亦有益而无弊”，“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7】。

《新潮》是一本很有影响的刊物。但在目前繁多的中国新闻史著作中，在笔者所接触的范围，对《新潮》有过论述的仅有以下数本：王洪祥主编的《中国现代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赵玉明等所编著的《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4本著作中，《中国现代新闻史》对《新潮》的论述最为详细；并且考虑到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月刊，创刊时间在“五四”以前，地点又在北京，影响比地方上的学生报刊大，为了符合历史真实，故将其放在毛泽东、周恩来报刊活动的前面。《20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史学卷》曾认为这是该书的编写特点之一——“新闻界人物以左为主，

jn 文章 jn 动态

上一篇 Previous

• 为报业发展提供市场化的环境支持
作者：尧润平 | 2005-01-10
从系统学的观点来看，报业生存其实也是一个系统生存，其良性运作除了有赖于自身内部系统各要素的协调配合，还依赖于报业大系统内各子系统的有机配合。报业大系统一般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读者、客户、竞争者、金融机……

下一篇 Next

• 北大新闻网研究
作者：程华 | 2005-01-06
摘要：作为北大校内最重要的新闻网站，考虑到电脑和网络在北大校内的高普及率，北大新闻网自从2001年建立以来已经有了比较大程度的发展，在国内高等院校同类网站中属于运作得相对比较成功的一个。尽管如此，它依然有……

如何提升 你的专业高度？

这里汇集国内20余家专业出版机构
近5000种图书，目前国内传媒专业
程度最高的网络主题书店 >>>

中华传媒书店
BOOK.MEDIACHINA.NET

中、右也不可少”【8】。尽管如此，笔者发现《中国现代新闻史》对《新潮》的论述中还存在史实上的硬伤——“罗家伦撰写了《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9】。《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的作者是傅斯年，署名为“孟真”；罗家伦撰写的是另一篇文章《今日之世界新潮》，同时发表在《新潮》的创刊号上。【10】

综合以上4本著作对《新潮》的论述，新闻史是这样总结《新潮》的积极作用：其一，认为《新潮》的出版，扩大了《新青年》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其二，有保留地肯定了《新潮》在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化中的贡献。但更多地是在强调其负面影响。如认为：《新潮》对产生封建道德、封建文化产生的根源缺乏清醒的认识。《新潮》在“五四”风暴来临之时，对政治斗争熟视无睹，未作反应。《新潮》在“五四”之前，出于标新趋时才宣扬社会主义等进步学说；“五四”以后逐步右倾，宣扬了不少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新潮》主张极端地崇外，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根据对《新潮》上文章的研究和相关文献的阅读，笔者认为以上的评价存在偏颇之处：对其功绩介绍不详，肯定不够；对其批评，则有扩大化、片面化之嫌。以下将通过梳理和分析《新潮》的基本内容，以此来证明笔者的观点。

二、探寻：对《新潮》的评价是否公正？

1918年10月13日，《新青年》编委重新组织后两个月，《每周评论》首次露面后不久，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北大学生举行了筹建一个新的研究团体的首次筹备会议，商讨创办杂志的问题。首先他们对杂志的内容宗旨作了界定，即要有“（1）批评的精神；（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11】其次，他们商定了杂志的名称，按照罗家伦的提议，定其名为“新潮”，徐彦之则为其取英文名称曰“The Renaissance”（意为“文艺复兴”），此与“新潮”之意正好相吻合。因为杂志的名称叫做“新潮”，所以他们的组织便叫“新潮社”。有论者认为，这是“共同的觉醒”——这些学生在被老师们作为中国希望的化身选拔出来以后，已对“空谈”感到厌倦，他们也同老师一样深信青年自身尚难配得上“新知识分子”的称呼，青年人必须比较具体地向社会显示他们具备的摆脱传统负担的能力。

【12】在由傅斯年撰写的《〈新潮〉发刊旨趣书》中，首先阐明了创办《新潮》杂志的动机和目的。他说，今日的北京大学，已经“脱弃旧型入于轨道”，不再只是培养“一般社会服务之人”，而是以“培植学业”为目的，是“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因此，虽然“同人等学业浅陋”，但“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其次，傅斯年提出了《新潮》杂志的四项责任：第一，“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认为只有让国人明白四件事，即“今日世界文化至于何阶级”、“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并时刻将这四点记在心里，才可渐渐赶上世界文化的大潮。第二，批判现实社会且探寻改造社会的方法。他认为，中国社会仍是“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这种社会“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使得“生活意趣全无领略”，所以他们要“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第三，培养群众对于学术的兴趣。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沉沦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只有让群众重视学业，有真知灼见，才能避免“苟且之行”，“不为社会所征服”。第四，使青年学术摆脱旧的思想，观点的影响，铸造新的人格。他认为，以往“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且代代相传，最容易受害者是青年学生。因此，《新潮》要向他们讲述“修学立身的方法与途径”，“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13】

这份《〈新潮〉发刊旨趣书》基本上决定了该刊今后的发展，为它的功和过都埋下了伏笔。以下将通过解答三个问题——《新潮》怎样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新潮》是否对当时的进步思潮熟视无睹？《新潮》是否真正主张“极端崇外”？以此探寻：对《新潮》的评价是否公正？

1、《新潮》是怎样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的？

《新潮》的出版，扩大了《新青年》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已为新闻史所肯定。但所影响的具体方面，除了“对新小说、新诗歌的创作作出了比《新青年》更多的贡献”【14】这一评价之外，其他则语焉不详。笔者认为，《新潮》是从这两个方面扩大的：一是具体探讨写作白话文的方法，使对白话文的认识更加清晰。二是关注文学改革的心理方面。

1916年到1917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对于文言文的弊端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对于廓清文学领域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迷雾，扫清文学革命道路上的障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了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基本原则，而且进行了写作白话文的尝试，在新文学表达形式的改革方面探寻出了切实可行的道路。但是，怎样开辟这条新道

路？怎样写出文意流畅、形式新颖的白话文？在此方面，还显得用力不足。大家都在鼓吹使用白话文，但是在写作白话文的具体方法却很少有人道及；一些激烈批评文言文的文章，其本身使用的正是文言文。据此，傅斯年在用白话文写就的文章《怎样做白话文》中，具体而深入地探讨了写作白话文的方法：一是“留心说话”，二是“直用西洋文法”

【15】。虽然他的观点不乏偏颇之处：如所提倡“欧化的国语”就过于偏激。中国的语言——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尽管有其缺陷，但也自有其长处。但是他主张将现代生活中口语词汇的引入白话文中去，通过留心说话练习白话文的写作；同时借助西洋的文法丰富、改造中国传统的构词造句的方法；他所指示的方向显然是正确的。

罗家伦所执笔的《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是当时影响甚广的一篇论战文字。“学贯中西”的胡先生，引证西方文学，对白话文学发难，得到一般国粹学家的击节赞赏。罗家伦利用自己的英语专长，逐条加以批驳，重申了白话文学的宗旨是创造“人的文学”【16】。这篇文章廓清了不少青年对白话文的认识，其时就读于浙江杭州第一师范的施存统来信说：“我们同学起初看见的胡先骕君《中国文学改良论》也有很多怀疑的，以为白话文未必可以全代文言，现在罗志希先生这篇《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真是对症下药。他们怀疑的所在，都被罗先生解释过了，信仰白话文的程度，谅来必定要增加了。我极爱罗先生这篇文字，我的同学也欢迎，这篇文章实在是不可少的。”【17】

白话文学一经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其发展速度十分之快。但当时一般人所关注的只是文学革命的形式，而非其内容。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中提出，只有改革文学“内心的思想”，才是文学革命最重要的任务【18】。同时傅斯年还主张变革思想不仅应该扫除语言、而且应该挖掘出“寄托在文学美术中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数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旷远超脱之境”【19】。《新潮》对心理问题的探索，在其的新诗试验中最为明显。俞平伯曾把普遍反对白话诗的原因进行了分类，承认古典语言是诗歌表达特别贴切的工具，相比之下的新诗粗糙而笨拙。但他坚持认为对新诗的反对终究不是语言的而是社会和心理的因素：“我常反问自己道，‘新诗何以社会上不能容纳呢？’……新诗尚在萌芽，不是很完美的作品。……现今社会，实在没有容纳新文艺的程度。……因为现今社会的生活，是非常悲惨黑暗，但又偏喜欢黑暗悲惨，但又偏喜欢‘粉饰’，爱念‘喜歌’，仿佛‘家丑不可外扬’这种神气。我们作诗，把他赤裸裸地描写出来，他们看了，自然有点难过，摇头说道，‘不堪！不堪！’”【20】

《新潮发刊旨趣书》曾说“本志志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21】，所以相较于面向年长、层次较高人士的《新青年》，《新潮》是面向中学毕业生的，它进一步深化了《新青年》所倡导的主张。如有青年学生认为，“就是‘文学革命’一块招牌，也是有了贵志才竖得稳固的（因为《新青年》虽早已在那里鼓吹，注意的人还不多）”。二者共同努力，影响甚巨，“大概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对于诸位，极其信仰，学白话文的也有三分之一”【22】。

2、《新潮》是否对当时的进步思潮熟视无睹？

《新潮》和《新青年》同是进步期刊，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赛先生”与“德先生”但在办刊方向上却稍有不同：《新青年》偏重于政治、思想、理论论述；《新潮》则偏重于思想、文学方面，介绍一些外国文学。因此，“《新潮》的政论文章不太多，大多数是艺术作品”【23】。但据此认为，“《新潮》创刊时，五四风暴即将来临，但这个刊物对当时政治斗争熟视无睹，未作反应”【24】则有失客观。《新潮》创刊号有着较为浓烈的政治色彩，这从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和傅斯年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上可以看出。

《今日之世界新潮》首先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潮流的新纪元。它写道“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俄罗斯的革命、奥匈的革命、德意志的革命，就是这个新潮的起点。”“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家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接着，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俄国革命之后的社会格局。它指出：革命以后。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必定相辅而行。……经济方面的趋势，将来都偏重集产政策，以一切的实业，全受公家的支配，使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有可以享受的幸福。……社会方面……实行普通选举，组织平民政府。接着，罗家伦笔锋一转，对这股世界新潮涌入中国之后的命运表示忧心忡忡，认为，中国民众缺少“智识”，社会上兵匪为患。为了避免动乱的厄运，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我们求学问的目的，必须有益于全体的人类，不是一部分人类。……第二，……凡是平民都受教育，兵工尤其重要。……第三，……人人要去劳动，无论劳心也好，劳力也好。”【25】

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潮的起点，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动向的人，首推革命先驱李大钊，他于1918年7月撰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世界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的血潮之中”

【26】；并在四个月之后，发表演讲指出，“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27】。这种惊心动魄的宏论，在当

时可谓金鸡独鸣，因为就连新文化运动的主帅陈独秀，迟至1919年1月，还批评俄国的“过激派”，“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28】。而罗家伦对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世界新潮，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文中运用了“山崩海覆”、“风起云腾”之类的浪漫言语，比李大钊的文章更为激越。不过，在阐述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格局时，罗家伦多次引用美国经济学家、政治家威尔博士的名著《新民主》一书中的言论，显得有点本源不清。因而，在深入剖析新潮的实质时，李大钊显然更胜一筹。在如何顺应世界革命潮流上，罗家伦的思路与李大钊颇有相通之处。李也曾提出应研究“无血革命”的方式，还指出“应该用此潮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29】不过，李大钊对世界潮流掀起的动荡，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那是新生的“苦痛”【30】；而罗家伦对此则相当消极悲观，预言动乱一起，中国将成为“生番的世界”。尽管如此，罗家伦是继李大钊之后，第二个撰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已经跃入时代潮流的前锋。

此外，傅斯年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也值得一观。1918年6月，傅斯年在《读书记》中写下了一遍评论俄国革命的文字。后来他将整理后的读书记，以《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为题目，在《新潮》一卷一号上发表。他说，近代历史的“精神”，“全在于思想自由”，自从文艺复兴以后，这种“思想自由”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宗教改革”，德国首先在这方面进行“试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获得成功。遂使世界各国在精神上脱离了宗教专制，这是德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第二阶段是“政治革命”，法国对此进行了“试验”，经过八十年的动荡，终于获得了“成果”，世界上不少国家根据它的试验结果重建政府，因而出现了真正的近代国家。这两种改革，都是人类文明史上应有的发展阶段。在这两种改革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阶段是“社会革命”。推翻“今日之社会”，建立理想上的社会，就是所谓“社会革命”，而俄国所进行的革命正是第三阶段之社会革命的试验，如果经过一番试验，能够得到一个“美满结果”，那么“人类进化，更进一层矣。”他对俄国的革命寄予厚望且评价很高：“将来俄国于文明史上，非同等闲。德哲人尼采谓俄独有兼并一切之能力；吾则谓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上面的这段话，是他在1918年6月写下的，到了11月中旬，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蔓延到了德国，傅斯年更满怀激情地说：“现在看来，我这话总算一部分说对了。中欧各国，起了社会革命了！俄国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往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但是不知道未来的“一八四八”还是就是在今年呢？还要等到明年呢？”【31】

虽然，由于办刊方向的问题，《新潮》自第2期起，创刊号那种浓烈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弱，其重心日益趋向新文学的创作，但对激进的政治思潮仍有提及。“五四运动”以后，罗家伦在写给国民党元老张继的信中，认为要改造中国的社会，应效法俄国革命，从思想上进行“一番革命的洗礼”。他写到“……俄国的革命，是以思想主义征服军队来的——其实当是征服军队，并且征服一切平民。所以俄国革命愈革愈好……”【32】五四运动以后，改造社会的热浪在进步思想界迅猛高涨，“社会主义”成为最时髦的新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名目繁多。可在1919年底以前，像罗家伦这样颂扬俄国革命的言论，还很罕见。

3、《新潮》是否真正主张“极端崇外”？

《新潮》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新闻史上基本都认为它主张全盘西化，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如在阐述《新青年》的缺点时，有过如下的论述：在《新青年》影响下出版的《新潮》月刊，认为中国思想界故步自封，“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甚至主张“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更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表现的典型一例，在部分青年中产生了消极影响。【33】但通过对深入地分析，笔者认为《新潮》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不过，如果不结合当时的背景、不仔细解读文本，他们的观点极易被误读。

以上引文中的“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一语，来自《〈新潮〉发刊旨趣书》。因为“今试问当代思想之潮流如何？中国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国人正复茫然味然，未辨天之高地之厚也”，作者认为“寻其所由，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之学术枯槁如此，于人于己两无所知，因而不自觉其形秽”。【34】对此的分析，必须考虑到当时的背景——国势衰微，民族危亡。在社会急速变革时，传统文明对社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显得更为鲜明刺眼。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越大，这种碰撞的争论就越激烈。由于缺乏对民族文化进行合理批判的从容时间，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往往把眼光滞留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对抗性上，提倡思想革命时过多地鼓吹西方思想。

“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出自福傅斯年撰写的《答余裴山》一文。原文如此：“觉得欧洲的东西都是好的，固然是荒谬极了；但是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人类文明的进化，都是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来，实在是先了一步，我们只是崇拜进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也是人类进步上的一个阶级，他们的文化，也是人类进步上的一个阶级；不过他们比我们更进一步，我们须得赶他……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

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我们对于西洋各种主义，当然要悉心辨别，一则看他对于西洋人的影响，再则看他对于中国人的情形：总是‘效果’为断，决不如张东荪先生骂我们崇拜外国偶像了。”【35】其中，诸如“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等，如果不联系上下文进行理解，是极易引起误解和争议的。其实，这段话有三个层次：一是认为西方文化处于比中国文化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上，所以它比起中国文化来得更进步些。因为中国文化的落后，其他的事情自然会落后，所以常常会作出彼是此非的判断。二是并未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是要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而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用以改造中国的文化。三是认为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要有所选择，要选择那些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来学习。据此，文中所持的言论虽然有些偏激；但对于破除封建礼教和守旧的观念，仍具有积极的作用。

实际上，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评价，《新潮》成员自身也在不断深化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中肯的过程。如1919年初，罗家伦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赞颂西方文学，贬斥中国文学，他声言：“我只知道学问艺术是人类大公的真理，只是有一个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国界的分别。”【36】3个月过后，他撰文说：“中国这次文学革命，乃是中国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文学进化史上不能免的阶级。”同时承认，对西方文学也应“分析研究”。【37】1920年5月，他致函友人表示：“我们很想东西洋文化接触之后，酝酿出一种新文化来。”【38】5个月后，在他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中，罗家伦提出了“东西文明融合论”，认为“东西文明接触之后”，将会“产出一种世界的新文明”。但这种世界新文明“断然不是我们专门依赖东方思想可以生出来的”；应该提倡西方人研究东方文化，东方人研究西方文化，这样“将来第三文明的产生，乃是自然‘化学的’化合，断不是牵强的‘物理的’化合。”【39】

三、结论：对《新潮》需要重新认识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闻史对《新潮》的评价，未能再现《新潮》的本来面目，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

当然，《新潮》自身的欠缺是其被误读的重要原因。《新潮》是一本由二十来个青年学生办的刊物。青年人顾虑少，胆量大，进取精神强，这是他们的优点，《新潮》能产生如此大之影响，都是因为他们充分发挥了这个优点。但是，青年学生阅历浅，思想单纯，也容易犯武断、片面的毛病。傅斯年就曾说过：“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出错。观察研究不能仔细，判断不能平心静气。”【40】面对大量舶来的西方的种种思想、主义，他们缺乏必要的判断、选择的能力，容易随波逐流。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和有着数千年积累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他们也不可能进行深入的批判、细心的鉴别；因而《新潮》的某些观点、对个别问题的表述，不无过激之处。最为人诟病的是，他们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见解幼稚，认定以文学作为载体宣传新思想新观念，以纯粹的学生运动为动力，便可以改变旧社会的面貌，并在此基础上自动生成新的政治制度。

不过，主要还是囿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观——毕竟《新潮》先后的两位主编都走向了国民党阵营，论者对《新潮》的部分评价不够公正。如认为“五四”以后，《新潮》宣扬了不少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以大量的篇幅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就是一例。其实，1920年是“五四”新思潮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一环，由于胡适的推波助澜，杜威倡导的实验主义哲学风靡一时，尤为青年学子非常爱慕，甚至连一批立志改造社会的激进青年也不例外。由周恩来所编辑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刊》的《发刊旨趣》中，就曾高唱：“现在世界的最新思潮是讲‘实验主义’”【41】。“五四”以后，《新潮》对政治运动日益冷漠，甚至采取贬斥的情绪，这在罗家伦的《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有所反映。但指责其为“等运动刚过，就立即暴露出背叛‘五四’精神的真面目”【42】，则嫌过分。考察一下“五四”以后青年学子的动向，便可以发现“鄙视政治”的思潮如洪水泛滥，在绝大多数进步青年眼里，政治运动成为“供野心家利用”，扰乱世界的“万恶之源”【43】。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函中也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顾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44】

《新潮》是继《新青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45】。《新潮》在“伦理革命”中并没有简单地攻击个性自由传统的缺乏，而是探究个人不愿对自己命运负责的原因，发现了鲁迅、吴虞等先师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服从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平静和安全感【46】。《新潮》曾探寻科学的世界观。创刊号上《人生问题发端》发表后，当即引起重大的社会反响。余裴山给《新潮》杂志写信说，“我们现在应该亟亟唤醒举国的青年，个个都有一种极高尚的纯洁的人生观念。就是应该如傅斯年所说的‘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47】《新潮》还对学术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认为要讲究讲究治学门径、使用逻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提倡大胆的学术怀疑。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在著作中曾对此赞许道，新潮社成员重新提出了被儒学思想家们长期忽视的“怎样”学习的问题【48】。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四重意义》一文中，也从一个老师的角度出发，对《新潮》赞誉道“表现甚为突出，编写皆佳”。【49】

丁淦林教授最近在《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一文中说道：“我们的立足点是，尊重历史，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我们的任务是，将历史的本来面貌，包括种种经验教训和曲折的历程，客观地全面地介绍给学生。”【50】因此，有关新闻史的著作在论述“五四运动”前后的进步学生报刊时，为了尊重历史，就不可不提《新潮》；或只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我们应该正视《新潮》的存在，在重新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合理取舍，力避片面；并且给其以客观、公正、合理的评价。

【注释】

【1】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

【2】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1卷，第379页

【3】 顾颉刚：《回忆新潮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4】 李小峰：《新潮社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0页

【5】 同【3】

【6】 同【3】

【7】 参见《傅增湘和蔡元培关于〈新潮〉的通信》，《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66页

【8】 徐培汀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9】 王洪祥主编：《中国现代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

【10】 罗家伦：《今日世界之新潮》，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革命》，参见《新潮》第1卷，第1号

【11】 同【1】

【12】 【美】薇拉·施瓦支著，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82页

【13】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

【14】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15】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1号

【16】 罗家伦：《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新潮》第1卷，第5号

【17】 参见《施存统的来信》，《新潮》第2卷，第2号

【18】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新潮》第1卷，第5号

【19】 傅斯年：《中国文艺界之病根》，《新潮》第1卷，第2号

【20】 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第2卷，第1号

【21】 同【13】

【22】 同【17】

【23】 俞平伯：《回忆新潮》，《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24】 赵玉明等：《中国新闻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25】 罗家伦：《今日世界之新潮》，《新潮》第1卷，第1号

【26】 李大钊：《法俄革命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

【27】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

【28】 陈独秀：《俄国包围过激派之运动》，《每周评论》第4号

【29】 同【27】

【30】 同【27】

【31】 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革命》，参见《新潮》第1卷，第1号

【32】 参见《罗家伦致张继函》（1919年11月8日），《新潮》第2卷第2号

【33】 方汉奇 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34】 同【13】

【35】 傅斯年：《答余裴山》，《新潮》第1卷，第3号

【36】 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新潮》第1卷第2号

【37】 同【16】

【38】 参见《罗家伦复熊子真函》（1920年5月28日），《新潮》第2卷，第4号

【39】 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第2卷第5号

【40】 同【1】

【41】 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42】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第131页

【43】 《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会员通讯》，1919年6月1日

【44】 《毛泽东致向警予函》（1920年11月25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44】 【45】 罗家伦：《回忆<新潮>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页

【46】 同【12】，第127页

【47】 同【35】 【48】 同【12】，第119页

【49】 【美】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50】 丁淦林：《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新闻大学》，2004年秋季号，总第81期，第37页

（指导老师：吴廷俊教授）

作者简介：

吴麟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04级研究生

E-mail: wulin0809@163.com

通联: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东三舍219室

邮编: 430074

吴麟

|| 传媒资讯网 || 传媒学术网 || 传媒考研网 || 传媒博客 || 传媒社区 || 传媒书店 ||

|| 关于我们 || 会员注册 || 交换链接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 2001-2007 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Copyright © 2001-2007 Media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